

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及对策

□ 张亦春

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更是现代企业运行机制改革与创新的必然选择。但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要建立这种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仍存在着许多难点。

1、产权主体未能真正实现多元化。产权主体多元化是将现行企业制度创新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根本要求,是削弱政府直接干预企业能量的一个重要措施。这个多元化的实质含义,不但在于主体形式上的多元,而且还在于多元化的主体在实际中是否真正享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名符其实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过去,一些企业通过行政手段把企业的固定资产一次性变为国家股;另一些虽在改制中吸收了其他股份,但国家股保持绝对优势,其结果使产权主体形同虚设,即多元主体虚位,政府仍可以“唯一股”、“优势股”继续干预控制企业,“斩不断,理还乱”,多元化流于形式。

2、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如何确立并由谁代表。我国在《公司法》里以法律形式界定了企业法人财产和出资者的所有权,这种关系的理顺在理论上优点比较明显:①企业可拥有自己支配的资本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②可通过法人财产的损益机制,约束经营行为,按市场法则办事;③割断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各种联系,摆脱束缚,开拓进取;④强化利益激励机制,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等等。但现实当中这种产权由谁代表,由谁管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3、现行企业领导体制功能失衡。现行的企业领导体制是带有相当传统色彩的厂长(经理)任命制,这是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一种集中代表形式。现在看来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足:①欠缺民主监督功能。企业领导升降去留依靠行政命令,厂长经理不是职业的企业家,“官本位”意识浓厚,无法集中精力管理企业,出现问题“易地交流”,甚至还可原地做官,民主管监督不力;②欠缺组织监督功能。现行企业是“两心”(党委是“核心”,厂长经理是“中心”)并存,而“两心”不合或摩擦现象亦非鲜见,党员生活会、民主集中制等亦多流于形式;③欠缺法制功能,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亏损,但厂长经理仍可游山玩水,有的甚至可美言为“考察”、“取

经”,缺乏专门的法律条款来约束。

4、现代企业管理意识淡薄,管理人才短缺。目前,人们对公司制、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的认识仍有待于普遍提高,“官本位”思想及传统仰上的惰性亦有待消除。许多人还未摆脱传统企业管理的框套,亦未能在更高的层次看到企业家的作用,更未能把企业及企业家阶层视为社会经济主体之一。此外,具有专门知识与丰富经验的现代企业管理人才也十分紧缺,尤其具有良好素质的职业化企业家更亟待培育。

5、制度创新的外在条件的完善还有待时日。首先,政府职能尚未真正转换,政府机构也必须进一步改革。企业改革很大程度上可说是政府改革,即改革政府的多重身份、多种职能并兼的不正常现象。其次,市场体系尚未健全。产权、资金、劳动力等市场严重滞后,规范市场运行的法规仍不完善。再次,改革的配套措施亦有待进一步制订与择时出台。这些都说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难度很大,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还需要包括体制、政策、措施等多方面的配合与支持。

6、现行企业的内在负担仍然沉重,主要包括历史债务和企业办社会。历史债务不但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也影响到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尤其随着专业银行改制为商业银行,银行可择优贷款,这会使某些企业更加贷款无着、还款艰辛。企业办社会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它不但分散了生产者经营管理的精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消耗了企业的利润,使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因此,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况,减轻企业负担,也是企业制度创新的一个难点。

二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难点或问题呢?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及我国改革的进程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若干对策:

1、进一步推动产权主体多元化,打破国家“唯一股”或“优势股”的地位。一方面进一步把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应是股份公司,这种股份公司具体比例多大,可参考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经验。如日本,注册资本在1亿美元以上的大企业中,股份公司占95%,而实际上市的仅为股份公司总额的2%。另一方面适当降低国有资产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比例。目前该比例一般为50%以上,这无法从实

质上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因此,根据具体情况设想:①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国家可保持优势控制,如煤炭、钢铁、铁路、航空、邮政、电力等。西方一些国家企业尽管以私有制为主,但关键部门国家也是保持100%控股的。②对于一般企业国家可保持较高的持股比例,但并非一定要在50%以上。日本的企业制度有个特点,即法人相互持股比例很高,如大企业(上市)中相互持股达75%,个人股份仅占20%。我国的企业形成原因与日本不一样,在大型企业中不可能有个人股份,但上述有一点可资借鉴,即在大中型企业中能否留出较高的比例让法人相互持股,这样国家可持有较大的股份也不致走向垄断,更不会转变成私有制。③一些中小型企业,国家可通过承包、租赁方式转换经营机制,此外国家还可通过托管这个创新形式来托管亏损企业。④最后对那些确实资不抵债的或经营效益极低下的企业干脆拍卖或破产,实现产权的完全转移。第三方面,适当提高企业职工持股比例。据调查,目前已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当中,大部分职工个人股所占的比重仅10%左右。这种状况对职工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不大,故须加大职工个人股比例,把职工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调动更高的积极性,真正搞活企业。

2、确立、维护企业法人财产权制度,建立政府授权的国有产权营运主体,由经济组织而非政府来代表产权。具体作法是,授权给企业集团中的母公司、投资公司、控股公司及一些具有控股能力的企业,使其成为国有资产的营运主体,某些经济主管部门、行业性公司,亦可改组为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这些公司以法人身份出现,通过资产纽带关系,从价值形态上运营国有资产,使其保值增值,决定国有产权的变动与重组及委托或推荐产权代表通过法定程序进入企业权力机构。但这些公司不同于过去的企业主管部门,它们不得行使政府管理职能,不能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由此理顺产权关系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创造必要条件。

3、促使新“三会”迅速定位,完善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取消厂长经理任命制,这也是《公司法》里的一个根本要求,具体步骤包括:①强化“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功能。“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工会)中机构重复、职能交叉的予以改进;②“老三会”过去承担的但现属于“新三会”的职能交给“新三会”;③“新三会”将自己的行为正位,以股东利益为取向,以市场经济效益为目标,不再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当然步骤都需按法定程序、公司章程或组织措施来进行。此外,基于我国的性质和充分反映企业职工的利益并调动其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职工代表可在监事会里占一定的比例。

4、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并加快相关的配套改革。首先,要转化政府职能,通过有关法律对政府的职能、作用、调控经济的方法及原则等做出相应的规定,彻底割断企业与政府

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促使政府行为由控制型转为驱动型,由维持型转为发展型。其次,改革政府机构,其关键是简化政府部门,撤消一些职能重复、工作效率低下的机构,精减政府人员,把政府对经济的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再次,创建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行业管理机制,这一点可借鉴德国的行业管理经验。在德国,政府与企业不存在直接的调控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通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各种行业协会(行业管理的载体)来联结,即政府主要通过政策法令联结行业协会,行业协会主要通过提供规范、指导、协调、服务等联结企业,行业协会与政府、企业均不存在隶属关系。这种管理方式,把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降到了最低限度。据统计,德国的企业主加入行业协会的比例高达90%以上,以企业身份加入各种协会的亦在90%以上。战后德国经济能稳定增长与此不无关系。我国在政府职能转变及现行的部门管理打破以后,“中观管理真空”可能会出现,因此,借鉴德国经验,以行业管理作为政府联结企业的桥梁,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5、更新观念,培育新型的企业家阶层。企业家是社会大生产的产物,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与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目前,许多锐意改革、开拓进取、效益显著的企业都与企业家的个人素质、领导艺术有关。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泰罗·梅奥指出:即使工资、奖金、福利和生活压力等激励因素都发挥充分,也只能调动职工积极性的60%,另40%有待领导以超群卓越的行为来调节。这个结论我们不敢断言具有普遍性,但至少说明一点:领导行为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不可缺少的,有时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为此:①树立“企业家是生产力”的观念、效益第一的观念及社会化大生产的人才观,革除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破除传统惰性及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观念与思维;②优化教育及科研机构,加强有关经济学科的建设与调整,组建国家级及省级企业家学院和研究院,培育既具有理论与实际才识,又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跨世纪人才,造就一大批高层次优秀企业家;③创造良好的企业家成长环境。如制定《中国企业家行为法》,以法律形式保证企业家阶层的建立,保障企业家的利益;亦可建立企业家俱乐部、协会及人才库,交流经验与思想;提高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6、分步骤、分对象消除历史包袱,减轻社会负担。主要对策包括:①对由政府“拨改贷”形成的债务,可以“贷改投”方式由政府转为资本金投入;②对政府决策失误或政策性亏损造成的银行挂帐,应由政府负担,分期解决;③对纯粹由企业经营不善造成的债务,应由企业负担,严重的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④对一些确实资不抵债者依法破产。对于企业办社会,其主要对策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与完善以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

(下转第13页)

率地带而流向投资高收益率地区,从来都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特征。国际金融中心,恰恰就是在这种资本流动中形成、发展、或者衰落的。由此可见,面向 21 世纪的经济开放和产业转型,粤港澳盛衰与共,加强合作实属必要。

其次,是在促进广东经济进一步开放过程中,如何依靠广东自身力量,并利用粤港澳合作,成功地实现产业转型的问题。

从经济开放促进产业转型角度来看,广东在轻工、服装、纺织业等产业方面已具相当的发展基础,并在国内外拥有一定的竞争能力。进一步开放、加强粤港澳合作的方向在于利用港澳的资金、技术、工艺和设备对现有产业进行高新技术改造,以增强该类产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能力。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合资、合营,也可以是技术信息交流或者技术短期培训。在机械、化工等重化工业方面,广东目前的发展实力比较薄弱,投资力量相对不足。粤港澳合作就要发挥各自的优势条件。广东在税收减免和市场让渡方面多制定一些投资优惠政策,港澳在资金投入和技术设备方面多提供一些合作和帮助,促使广东重化工业中的非电气机械、电气机械、运输设备、通讯设备、精细化工优先成长起来。在汽车、电子等支柱产业方面,粤港澳合作的重点在于实现产业的规模化经营。港澳大财团应更多参与该类产业的投资,以扩大支柱产业中的企业投资

和经营规模;也可以在金融融资方面为广东企业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在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方面,粤港澳合作的前景也非常广阔。广东应在确定基础产业经营标准管制方式的前提下,进一步开放基础产业投资和经营活动,以鼓励港澳资本以合资或独资形式介入基础产业的建设和营运活动,增强广东产业结构克服基础产业发展滞后这一障碍的实力。最后,在原材料产业方面,粤港澳合作可采取举办资源开放型的跨国公司方式。广东本省原材料资源不足,大部分原材料和资源都是靠外省调入或进口,制约了本省经济的发展后劲。广东借助港澳的协助,到海外投资铁矿、煤矿、石油以及木材等行业,可作为广东经济进一步开放“双向交流”中“走出去”的一种形式。在这方面,国内一些部门和公司已走在了广东前面。例如,首钢在秘鲁收购了一个铁矿场,中化公司也在美国投资收购了炼油厂和磷肥厂各一个。目前均不仅提供了原料,而且有了盈利。相比之下,截止 1993 年 11 月,广东的境外企业约 557 家,其中 452 家驻港澳,105 家驻海外。不过,这些境外企业除驻港澳的有一定规模外,在海外的普遍规模较小,属办事处、联络站性质。此种状况,极不适应广东进一步经济开放和产业转型的需要。通过创办跨国企业发展广东跨国型的原材料产业,已成为广东原材料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 □

(上接第 8 页)

保障制度,并逐渐覆盖至全社会,为企业改革与制度创新解除后顾之忧。

7、推动产权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产权流动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标志。产权流动非流失,产权只有流动,才能更好地实现资产的价值与增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的法人财产制度也才能算真正建立起来。具体措施可包括:①加快产权交易的立法规范,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条例或办法;②有步骤地扩大产权交易,防止一哄而起炒产权、炒企业;③拓展产权业务,增强服务功能,如招商、

引导海外资金参与国内投资、协助客户策划企业收购与兼并等;④有计划地发展产权交易所及其他中介组织,建立协调、引导与管理产权交易的机构,处理产权交易各方的关系,为产权交易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8、借鉴国外经验,建立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如美国专门设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局,负责中小企业有关事务,支持、资助、推动中小企业的规范发展。我国的中小企业亦占相当比例,故可借鉴此经验,推动中小企业加速制度创新,转换运行机制,减少政府的不必要的干预和负担。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上接第 10 页)

市场竞争主体。在这三个层次中,第一层只是在政府部门设立专司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比较好办;第三层本来就存在众多的基层企业;实质性的改革在于建立第二层的国有资产中介运营机构,这是国有资产管理与经营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国有资产法》应该强调的一个重点。

记者:您估计我国第一部《国有资产法》何时能正式出台生效?

徐:如前所说,这部法仍在紧张的修改之中,估计明年修改工作会结束,什么时候能得到全国人大的通过,就不好说了。但根据现在的形势,也不会太晚,应该在 1996 年前出台。因为国有资产的管理与经营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

重视,尤其是我国党政领导多次表示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前些日子朱镕基副总理的再次强调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当然,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最后,我想再强调一点,制定出台了《国有资产法》,就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有法不执法比没有法更糟糕,因为法失去了权威性、严肃性而变成一纸空文很可怕。据说,《矿产资源法》公布 8 年,破坏资源的乱采乱挖现象却成倍增长,《环境保护法》也已公布多年,但有些地区却污染更加厉害,等等。如果《国有资产法》出台后仍有类似情况,那不仅难以保证国有资产在管理与经营中保值增值,难以维护国家所有者的权益,而且将会影响市场经济的进程,其消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